

沒有愛國品牌 民主就是假貨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頂天立地

民主和愛國，前者是政治命題，後者乃與生俱來的高尚情操，二者並沒有從屬關係，追求民主者不一定愛國，愛國者也不一定崇尚民主。不過，如果一個人不愛國，那民主只不過單純是權力交替的程式，對國家發展、民族復興毫無好處，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和沒有自尊的民族，對十三億人民也就毫無保障。所以說，沒有愛國品牌，民主只是一句空頭口號，只是政治野心家騙取人民信任的假貨。

有報章在七月九日刊出一篇題為《沒有民主，何來愛國》的文論。其實，根本不用看其內容，只要看到這個題目，就足以令人嘖嘖，難為老牌報章尚將其當寶，惟恐其他人不識貨。

民主和愛國沒有必然關係

所謂《沒有民主，何來愛國》，在邏輯上已屬狗屁不通，因為眾所皆知，民主和愛國並沒有必然關係。民主只是近代才出現的政治術語，在沒有民主之前，愛國主義已存在了幾千年，難道我們可以說，岳飛是民主鬥士？屈原是為了民主投江？或者一概而論，在沒有民主之前，古往今來的仁人志士都不配當愛國者？

無可否認，民主並沒有絕對標準。中國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沒有西方民主指定的社會運作模式，但中國的領導人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決定，體現了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精神。再說，共產黨有八千萬黨員，連同其擁護者有數億之眾，已奠定了民主的基礎，和世界上任何一個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政權相比也不遑多讓。反而，有很多實行西方民主政制的國家，選舉過程中充滿貪污舞弊，或由大財團操控，民主的含金量並不高。就以號稱世界第一民主輸出國的美國為例，多年來也不過由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團的兩大政黨輪流主政，不少人對兩黨主政不滿，但也沒有第三種選擇，難道，這才是惟一的民主？

從事實所見，今日的所謂民主國家，又有多少人民會對他們國內的狀況感到滿意的呢？這些國家的人民每天都活在恐懼之中，恐怕失業；恐怕失去社會保障；恐怕治安失控引致禍從天降；恐怕政府揮霍無度引致國家破產；恐怕政治鬥爭帶來社會分裂；更害怕霸權主義引來恐怖主義的復仇。就是現在的香港，市民對政黨政治也絕無好感，雖然反對派口聲聲要「還政於民」，不過我們完全可以預料，到了反對派掌權這一天，也就是香港大亂的一天。幸好，這一天是永遠不會到來的，因為大部分人民並不願意走上政治舞台，他們只想有一個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

愛國是民主的前提

《沒有民主，何來愛國》，和某些人所說的「沒有房子就不結婚」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要求有房子才結婚也沒有什麼不對，達不到對方要求，仍可以嫁娶由人。但要求有民主才愛國，發展下去，是否沒有民主就可以不愛國，甚至可以賣國呢？這並非誇張之言，因為在香港，我們早就看到了這一現實，當年李柱銘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要求國際制裁中國，不正是活生生的表演嗎？《文匯報》同文黃熾華所言，「沒有民主，何來愛國」的論題不過為「洋奴」、「漢奸」蓋上一層掩醜布，實在恰當之至。

民主和愛國，前者是政治命題，後者乃與生俱來的高尚情操，二者並沒有從屬關係，追求民主者不一定愛國，愛國者也不一定崇尚民主，不過，如果一個人不愛國，那民主只不過單純是權力交替的程式，對國家發展、民族復興毫無好處，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和有自尊的民族，對十三億人民也就毫無保障。所以說，沒有愛國品牌，民主只是一句空頭口號，只是政治野心家騙取人民信任的假貨。

九龍東聯網不斷改善服務

雷操奭醫生 醫院管理局九龍東醫院聯網總監

我首先要代表九龍東醫院聯網，感謝李華明議員對九龍東醫療服務的關注，並於日前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動議辯論，讓社會各界及立法會議員更深入探討這議題。

九龍東醫院聯網是醫管局七個聯網中，其中一個長者比例較高的聯網。人口老化是九龍東面對的其中一個重大挑戰，我們一直從改善現有的硬件及軟件配套積極着手，努力為區內的長者提供更佳及便捷的醫療服務。

李華明議員日前撰文提及九龍東聯網的眼科服務，作為聯網管理層，我認同必須加強這方面的服務，回應區內長者的需求。有見及此，九龍東聯網已經在轄下的將軍澳醫院，新成立了一個白內障中心，並已於今年五月正式投入服務。有了這個專門的白內障中心，九龍東聯網的白內障手術服務量，將可以提升一倍，由過去的每年約二千五百宗，提升至約五千宗，預計病人的輪候時間，亦可以於未來一、兩年內，大幅縮短至約兩年。

為了進一步縮短病人的輪候時間，九龍東聯網亦於今年初開始，將部分病人分流到港島的葛量洪醫院接受白內障切除手術。

九龍東聯網會特別安排專車接送，毋須病人舟車勞頓。

除了眼科服務外，我們亦注意到區內長者病人對其他服務的需求。九龍東聯網已於2010至11財政年度，在基督教聯合醫院增加復康病床的數目，亦已增加了家庭醫學專科、內科及老人科近5000個專科門診的診症名額，以應付需求。另外，九龍東聯網於今個財政年度，亦會加強長者綜合護理服務，為430名長者病人，提供出院規劃、復康、個案管理及家居支援服務。我們亦會於觀塘區設立一所綜合性社區健康中心，加強基層醫療服務，為區內長者提供更佳的健康支援。

至於擴建基督教聯合醫院的計劃，就正如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梁卓偉教授日前在立法會發言時所提及，政府已原則上接納該擴建計劃，我們目前正積極進行擴建工程的前期策劃工作，完成後會按既定程序申請撥款，盡快展開工程。

我們明白市民對公營醫療服務存在不少期望，亦感謝立法會議員對我們的服務經常提出寶貴意見。聽取各界的意見後，九龍東醫院聯網會不斷改善服務，回應社區的需求，為九龍東的居民提供更理想及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朱民任職IMF副總裁的象徵意義

張敬偉

一如預期，IMF總裁拉加德7月12日提議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特別顧問、中國央行前副行長朱民擔任該組織副總裁一職，這是IMF新增的第四個副總裁職務。

朱民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在2010年2月出任IMF前總裁卡恩的總裁特別顧問之前，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卡恩因性醜聞辭職，坊間一度傳出新興國家有意捧朱民為IMF總裁候選人的消息。事實證明，這不過是輿論的一廂情願。現實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決定了現時IMF不可能由一個中國人來擔任總裁。

體現新興國話語權的提高

經過一番大國博弈，法國人拉加德還是接替她的同胞卡恩成為IMF總裁。值得一提的是，在後卡恩時代的總裁博位戰中，中國支持拉加德。因此，此番朱民擔任該組織第四個副總裁職務，既是中國經濟實力的體現，也是拉加德對中國的回報，更彰顯了一種象徵意義，即代表着新興國家在這個組織裡的話語權提高。

戰後全球經濟格局，是以美歐主導。突出體現在美歐分肥機制上：即形成了世界銀行由美國主導，IMF總裁由歐洲人擔任的慣例。直到近年來，隨著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的興起，尤其是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新興國家才希望調整或改變由西方人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

美歐流年不利，先是美國華爾街風暴誘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繼而歐洲發生主權債務危機，而且日本陷入長期經濟低迷。西方國家的集體沉淪，讓新興國家的膽氣增加，並要求在IMF內擁有更多的投票權。根據2010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方案，「金磚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將大幅增加至13.1%，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將達到14.81%。不過，從「金磚國家」2010年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大於60%（同期發達國家的貢獻率只有30%左右）看，新興國家在IMF內依然屬於配角。尤其中國，經過幾次配額和投票權調整，中國在組織內的話語權依然和其全球第二大經濟和貿易雙料強國的地位不相稱。

西方仍佔主導地位

雖然西方媒體將朱民未來的新職務解讀為中國日益提高的影響力和新興市場日漸加大的話語權。但諳熟國際關係和IMF運作的觀察家們都曉得，這種抽象的象徵並不會化作現實的利益。

從國際關係而言，西方國家一直在抱團守住世界銀行和IMF兩大組織主導權。對美國而言，選擇一個歐洲人更讓其有衛道西方機制的安全感。所以，在卡恩辭職，輿論探討中國人是否有機會時，《華爾街日報》認為，美歐都不會同意讓一個中國人成為IMF總裁。在歐洲，與其說是對一個國際組織職位的爭奪，不如說是對歐盟傳統榮譽的捍衛。而且，在攸關歐盟整體利益的國際博弈中，歐盟向來是用「一個聲音」對外。

相比之下，在卡恩辭職之後，新興國家卻一團紊亂，在選誰接卡恩的班時無法達成共識。所以，一個法國男人走了，另一個法國女人又來了，這就是現實的國際現實，也是西方國家和新興國家綜合實力不對稱的體現。

就此而言，中國人朱民擔任這個組織的第四個副總裁職務，固然是中國影響力的體現，或者說安慰了新興國家。但其實更具榮譽意味：一是IMF的組織架構決定了朱民只是拉加德的助手，不是國內正副職「民主集中制」的決策模式；二是中國在這一組織的話語權並沒有根本的變化。

圍立會堵道路 憤青無法無天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不論示威者有什麼訴求，但表達的方式都必須和平守法，這是大部分港人的共識，也受到法律所保障。現在一班憤青卻變本加厲，視癱瘓交通、衝擊警方，甚至羞辱官員議員為常事，動輒糾眾包圍立法機構，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容許。警方果斷執法有強大的民意支持，對於違法的行為應依法追究，將本港的遊行示威文化重回正軌，保障市民的安全及利益，不應因為一小撮憤青的不負責任行為而要全港市民付出代價。

在「七一遊行」期間罔顧市民安全，癱瘓中環交通的社民連及人民力量一眾憤青，在今個立法會會期最後一次會議舉行期間，以反對遞補機制為由，發起所謂「包圍立法會」行動，部分示威者更在遊行至禮賓府期間意圖衝出馬路，並推撞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令花園道及下亞厘畢道一段一度封閉。而包圍立法會的憤青也不斷在喧嘩鼓譟，騷擾會議進行，甚至將紙張擲入立會。一班憤青公然包圍本港的立法機關，干擾會議進行，更屢屢堵塞交通要道，其行為視本港法紀如無物。正如保安局局长李少光強調，當局絕不容許任何衝擊法紀的暴力行為，倘有人其所為可能危害他人或公眾秩序時，警方會果斷執法，並考慮採取拘捕行動。警方如果不能堅定維護法紀，人民力量、社民連之流只會有恃無恐，社會將永無寧日。

堵塞馬路衝擊警方是和平理性？

不少社運人士或反對派議員，總喜歡偷換概念，將憤青的衝擊行為指為和平理性的示威，不時批評警方的執法行動是打壓示威者，打壓言論自由。一班黨業示威者及「資深憤青」，在電視機前總裝出一副講道理的樣子，自稱示威只是表達訴求，在和平理性之下進行，但一到示威之時，立即「充血上腦」，向警員亂叫亂衝，粗口辱罵、衝擊警方鐵馬已是常事，就算警員克制地將他們抬離現場，也要高呼被警員粗暴對待，要批評警員云云。這班示威者的言行無論從任何角度上，都與和平理性守法的示威沾不上邊。他們多次違反遊行指引，在途中突然搶佔車水馬龍的車道，令車輛行人險象環生，已經觸犯了本港交通條例，又何來和平理性？警方依法拘捕是合情合理合法，沒有可議之處。社會也不應將違法行為與和平示威混為一談。

人民力量及社民連等激進團體，眼見「七一遊行」後有油水可撈，於是借遞補機制的議題再作出擊。然而，當局已經從善如流延後表決重開諮詢，激進派的攻擊已失去了着力點，如果黃毓民等真的是順應民意，理應鳴金收兵，將精神放在遞補制的諮詢上。然而，他們仍堅持包圍立法會，這樣做本身已經十分可笑。試問立法會已不會就遞補制進行表決，甚至整個會議都不會討論有關遞補制事情，一班憤青還去包圍立法會幹什麼？在立法會高呼反對遞補制又有什麼作用？黃毓民等人根本解釋不了，只是一味煽動憤青去包圍立法會，去聽他發表演說，好像小學生般將

世紀風雲

中國與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南海主權風波最近似乎稍有淡化，但中日在釣魚島海域的爭執又起風波。中國周邊面臨的諸多挑戰，以及國際舞台上中國在發揮日益重要作用的同時，正在承受日益沉重的壓力，其實都折射了中國外部崛起過程中的某些必然邏輯。

中國外部崛起迅速 挑戰不少

由於近年中國的外部崛起非常迅速，因此一方面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正在發揮越來越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年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來說，若沒有中國的參與，世界經濟很可能還將繼續在黑暗中徘徊；但另一方面，中國也開始承受到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這些國際壓力有些來自西方大國的偏見，有些則屬於中國崛起後自然應該承擔的責任，而更有些則是由於中國崛起後，其勢力必然要向外延伸並與其他國家產生摩擦乃至衝突。比如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能源需求，必然要求中國能源利益向外延伸，也必然要求中國海軍勢力外延，其間與其他國家的潛在衝突就可想而知。

中國能否應對並化解這些挑戰，將是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國在此過程中能否做到從長遠看使中國的戰略空間有所擴大而非縮小，朋友有所增多而非減少，將決定若干年後中國的崛起勢頭和前景。

內部轉型：外部崛起可持續基礎

但與中國外部崛起同時發生的，還有另外一個也須謹慎應對的過程，那就是中國的內部轉型。近年，我在中國一些地方演講時，經常用三句話來描述今天中國在內部轉型方面所處的狀態，即：一、巨大的成績與巨大的問題同時賽跑；二、相信成績一定能跑過問題；三、不能因為成績一定能跑過問題而忽視問題的存在。

中國內部轉型顯然是一個值得專門研究的課題，也是中國未來面臨的另一個艱難挑戰。但同時值得研究的，是中國外部崛起與內部轉型之間的關係。在這方面，我又常用幾句話來概括兩者之間的關係：一、今天的中國外部崛起迅速，內部轉型艱難；二、外部崛起常成為今天中國的亢奮點，而內部轉型則每每成為今天中國的疑難症；三、每當內部轉型艱難時，人們常有意無意地專注於外部崛起的成就或衝突，並由此淡化了對內部轉型艱難的關注；四、內部轉型成功是任何外部崛起的必須前提和可持續基礎，沒有內部轉型成功的外部崛起將成為無本之源。

然而，人人都知道今天中國的內部轉型知易行難。今天的中國在內部面臨三大轉型：就工業化形態而言，中國正在從一個傳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就經濟形態而言，中國正從原有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就社會形態而言，中國正由原來的封閉社會向日漸多元開放的公民社會轉型。三大轉型都很迅速，但都頗不徹底，均存在相當程度的「非典型狀態」。

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而言，歷史和國際的經驗證明，凡是工業化進程開始後的二、三十年，都是城市化開始的時候，亦即大量的農村多餘勞動力進入城市，成為城市裡缺乏技能而又廉價的勞動力；於是，農村開始荒蕪，類似中國的「三農」問題開始出現，而城市能否消化這部分缺乏技能的勞動力，同時解決在此過程中出現的勞工權利、貧富不均、社會治安等嚴峻問題，成為現代化完成初級階段後面臨的嚴峻挑戰。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中國能否維持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秩序，不但是是一個經濟學、社會學的難題，同時更是一個政治學的課題。

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而言，今天的中國顯然早已不是典型的計劃經濟，但也絕非成熟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市場和政府的分離，以及在市場和獨立法治之間的三位一體的關係並未

在今天的中國真正確立起來。於是，在中國迅速發展過程中才會有那麼多的腐敗和官商勾結現象。與此同時，如果說一個正常的社會結構應該是呈「橄欖形」，亦即「兩頭小，中間大」（貧富兩頭相對較小，而中產階級則比較龐大），那麼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則呈現嚴重的「啞鈴型」，即「兩頭大，中間小」，一個弱小的中產階層在苦苦地支撐着貧富兩個龐大的群體。更重要的是，這種「兩頭大，中間小」的社會結構不但蘊藏着極大的社會和政治風險，而且就其根源而言，主要來自市場和政府的分離無法確立，以及市場、政府和獨立法治之間的三位一體的關係無法得以實現。